


危羚 著



一个广播人  
的  
多维思考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危羚 著

一个广播人  
的  
多维思考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广播人的多维思考/危羚著. - 天津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5.8  
ISBN 7-80688-209-X

I. 一… II. 危… III. 广播新闻-新闻工作-文集  
IV. G21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7057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出版人: 项新  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 
邮编: 300191  
电话/传真: (022) 23366354 (总编室)  
(022) 23075303 (发行科)  
电子信箱: tssap@public.tpt.tj.cn  
印刷: 天津市雍阳印刷厂

---

开本: 850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张: 14.5  
字数: 386 千字  
版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 1 - 1000 册  
定价: 30.00 元

---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序 一

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，也不知道该怎样写序。可是当他捧着厚厚的书稿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。

我认识危羚是从他的名字开始的。“羚”，羚羊的羚，我想他一定属羊，果不其然，不仅属羊，而且与我同龄。第一次见到他是在《天津早晨》的值班室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善言谈，宽宽的眼镜后面有一双总在思索的眼睛。后来我参与值《天津早晨》早班，处理过他写的稿子，给我的感觉是他擅长经济报道，而且稿子也很有深度。后来，我当了总编辑，负责“创优”，他就成了创优出好稿的一名干将，列入了我的“视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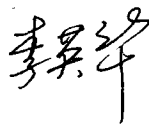
我答应为他的书写序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同龄，还因为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编辑记者，我不愿意以台长身份为他做序，我愿意以一个同龄人，一名普普通通、有着同样经历与感受的记者向读这本书的年轻人讲几句心里话。

一个人，当他选择了记者，选择了广播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将不停地发现，不停地思索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索，直到他终止这项工作。而在千千万万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之中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，都会思索的。会发现的能够在一个小小的会议中“钓”

出“大鱼”，会思索的可以从同一个新闻事件中选取能够获大奖的角度。而要做到会发现、会思索，就要不断地学习，给大脑增加“润滑剂”，使之不停地高速运转，直至“失眠”，危羚是这样一位记者，他失眠的时候吃两片安定都无法入睡。

这本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，当记者要善于积累，有的人干了一辈子新闻也留不下几篇自己采写的稿子，更不要说好稿。而他则是一个“有心人”，不仅留下了获奖作品，还有十几篇论文和报告文学，虽然他谦虚地说有些作品“或许稚嫩和流于疏浅”，但我也许连这起码的疏浅也汇集不起来呢。我希望读这本书的年轻人欣赏作品为次，学习他的精神为主。

令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他在经历坎坷之后，依然执著地衷情于广播，我似乎看到他在整理这本书稿的同时，又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……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'李兵' (Li Bing) in a cursive style.

2005年7月11日

(作者：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)

## 序二

28年前，作为“文革”后全国恢复高考招生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危羚考入了我校中文系。当时，我还是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青年教师，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相识了，并很快觉察到他是那个踏实聪慧的好苗子。如今看到他这本刚刚打印好的书稿，证明了他的实力。

危羚那一届学生给许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质量高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危羚在这个为数不多的群体中，是个品学兼优，多才多艺的佼佼者。他平时善于思考、勤于实践，在学期间撰写的文学评论就见诸报刊。这在当时，作为一名在校中文系大学生，能够把文字变成铅字，是很令人羡慕的。平时学习也是一样，他并不死啃书本，但遇到问题，他会抓住不放，直到弄懂为止。那时，他是班里的体育委员，而且是田径场上的活跃分子——学校100米、200米短跑比赛的冠军，还创造过200米的学校新记录。我印象中，危羚那时还是系里排球队的二传手，桥牌打得也好。不仅如此，危羚还是学校文艺工作的骨干。他是当时学校文工团的副团长兼指挥，手风琴拉得好。那是1979年吧，他创作的管弦乐《大学校园圆舞曲》，获得那一年全国高校文艺汇演一等

奖。现在看来，危羚的才思敏捷和多才多艺，对他日后的工作大有裨益。他钟情广播，在广播上终有所建树。

读了危羚的这本《一个广播人的多维思考》，我最突出的感觉之一就是，他是个勤奋、肯用心、善动脑的好记者，是个不想因循守旧，乐于不断创新的好编辑。看得出，本书中所收集的，只是他十几年来所写的广播作品中的很少一部分，是精华，因为大部分是他的获奖作品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他懂广播，具有广播记者特有的视角和切入点，而且常常能够在别人不经意处着眼，发现别人所忽视的有价值的新闻，这一点很不容易。的确，作为新闻记者，发现新闻是需要一些本事的，是需要特别的功力和敏感。许多身为记者的人为不知新闻在哪里而苦恼。我想，当看了这本书，他是会有所收获的。

危羚所采写的新闻，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有大量的深度报道。深度报道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国新闻文坛上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，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，以其独有的深度、力度及广泛的社会影响，向单一化、片面化和表面化的传统报道方式发起了挑战，因而极为引人注目。对于这种新闻文体，有人称作深度报道，有人称作思辨性新闻，也有人称作是全息摄影式新闻。所谓全息式，就不是平面的，单视角的，而是立体的、全方位的、多维的。危羚的很多报道就具有这样的特点。但危羚的多维思考还并不仅仅表现在这里，看过他的书稿之后，我明白，作为一个广播人，他所关注的问题更加广泛，他所运用的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；他的思想是多维的，他的作品是多维的。而这正是本书最难得的地方。

从新闻的角度而言，危羚所涉猎的范围比较广。有消息、通讯、述评、评论、报告文学等等，当然还有广播所特有现场直播、录音新闻，以及广播的新闻节目、经济节目、生活节目和娱乐节目。而且既有正播节目，也有娱乐和脱口秀节目。我感觉，他每做一档节目都很用心，都力求有所创新，有所突破。从书中，尤

其是通过页脚的注释，我看到了作者在节目创新上的良苦用心。

的确，当一个好记者和好编辑不容易，而当一个思想睿智，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好记者好编辑就更不容易！

危羚是一个学者型的记者编辑，他不追赶时髦，而是力求扎扎实实地做学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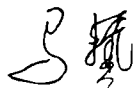
危羚从事广播工作到目前为止有17年了，要说时间不短也不是很长，但他是全面的。他不仅有丰富的广播实践和新闻实践，而且有很多东西已经上升为理论。因此读他的理论文章不会感觉空泛，不是空中楼阁，也没有卖弄和晦涩，而是有理有据，有理论有实践，这显然是和他多年工作在新闻和广播的第一线分不开的。这是我在读了本书“论文”一章之后最突出的感受。而更为难得的是，他在从事广播和新闻的实际工作中，能够在采编的间隙中关注新闻基础理论的研究，而且有些理论问题是新闻界所一直没有解决好的，比如什么是“新闻”，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止，危羚的观点是从实践中来，有深厚的实践做依托，有扎实的逻辑知识做基础，我以为是应该受到重视的。而他另外一些研究却是理论界所忽视的，比如“新闻的本质特征”问题。危羚认为，“报道”也是新闻的本质特征之一。这个观点是新鲜的，是值得认真对待的。在这本书中我还看到，他在广播实践和研究中，将广播与电影作了比较。这使我发现，他不仅熟悉广播，同时也熟悉电影，熟悉美学理论。能够将广播语言与电影语言的异同进行对比并做深入研究的，的确是凤毛麟角，是很难得的。这也又一次体现了出了他多才多艺和善于多维思考的特点。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从全国的角度，从“实施大广播战略”的高度，提出了“网络”技术应该在广播改革上发挥重要作用。这些观点，都有着先见之明和较高的学术价值以及指导意义。

危羚还是一个作家型的记者。他在采写了大量广播新闻的同时，又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，有的题材重大，有的感情细腻，文笔流畅，读来令人感动。



危羚的作品有的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象收进本书的论文《面向 21 世纪的“大广播”战略》以及《对〈新闻理论〉一书中新闻事业性质的二重性问题的几点质疑》等等在发表后反响强烈，前者在《中国广播》发表后，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》又摘要刊发了该文。两个国家级刊物同时发表一篇文章，这很少见，说明这篇文章的分量。而后者发表后，陆续接到《中国新世纪理论经典文库》和《走向新世纪》等许多大型文集的入编邀请，还接到许多大型理论研讨会的邀请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另外，他的报告文学《一个终于公开的故事》，2002 年 9 月在《今晚报》上发表，并获奖，时隔两年，又在美国发表，而且引起了更大的反响。

我感觉，危羚的广播作品丰富多彩，质量上乘，理论文章论述严谨，因此，他的作品能够集结出版，是一件好事；作为他的朋友和新闻同行，我为他高兴。他的这些新闻作品不仅为业界增添了许多亮点，其中的理论研究有很多地方也给学界探讨新闻改革给予了不少启示。我相信：危羚在今后的新闻与广播实践中，出于他手的作品一定会更加成熟，更加完美。



2005 年 7 月 15 日

（作者：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，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，天津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。）

## 导 言

一个广播人的思维应该什么样？

没人告诉我。

当我在广播圈里摸爬滚打了17年之后，我的体会是，作为一个广播人，除了像平面媒体记者一样，学会用普通的新闻语言去思考之外，还必须学会用具有广播特点的新闻语言去思考，学会用话筒去思考，用广播中的音响去思考，用各种不同的广播节目思考，甚至还要学会用广播以外诸如理论的、文学的等等更多的思维方式去思考。

也许，这就是一个广播人所需要的全方位立体思维吧。

—

要谈思考，首先应该先谈谈发现。

应该说，发现是很多职业都应该具备的素质，但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尤其重要。

不是吗？当记者，你要去发现新闻线索；当编辑，你要慧眼识金；搞理论研究，你要去发现问题，深入研究探索；至于搞文学，那更是如此，罗曼·罗兰不是有句名言吗：世界上并不缺少美，缺少的是对美的发现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发现与思考是一回事。

但依据我多年来从事新闻写作的体会，我觉得，会思考与会发现，还不完全是一回事。

那么，什么是发现？举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例子：“9.11”事件发生时，飞机撞向世贸大厦。如果你在现场，马上发回一条新闻：“一架飞机几分钟前撞向世贸大厦。”这样一条消息不能说没有思考，但严格意义来讲，它只是个“发现”。

那什么是思考？还是前面这个例子。假如你在新闻中接着写到：“目前还不知道这到底是飞机失事，还是人为破坏。”我以为，后面的这句话便是“思考”了。

当然，上面这个例子，是将“发现”与“思考”截然分开了。我这样做，只是想说，在新闻采访中或许有比思考更“前卫”的东西。这里的“前卫”，不是“时髦”，而是说有比思考位置更靠前的东西。是什么呢？我觉得，就是“发现”。

其实，像“9.11”这样的新闻事件，难的是你千载难逢。而一旦遇到了，那么“发现”就并不难，因为你看见了。困难的也许是接下来的分析思考。但是，究竟有多少类似“9.11”和“海湾战争爆发”这样的新闻大事件能够让你捕捉到？对于新闻记者而言，能抓到这样的新闻毕竟是很“幸运”的事情。实际上，在生活中，更多的新闻要靠你的职业敏感去捕捉，要靠你去“发现”。

记得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两篇报道。一篇说，“目前城市交通地图的出版，已赶不上城市建设的步伐”。还有一篇，说的是“红灯亮，骑车人停下一群；绿灯行，地下痰迹一片”。这两篇新闻我们都承认它没有“9.11”和“海湾战争爆发”那么大的新闻价值，但前者，人们一般很难会从一张地图上发现有什么新闻线索，而后者则更容易在人们的熟视无睹中忽略其潜在的新闻点。我觉得，这两位记者“发现”新闻的本事都不可低估。

这使我有了一种对新闻的感悟。我觉得，新闻记者首先是一个发现者，然后才是一个记录者。实际上，很多新闻的采访过程，

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，甚至更夸张一点说，就是新闻中有新闻，新闻背后有新闻。就看你能不能发现！

说一个自己体会很深的例子。

本书中有一篇报道：《从拿出40万到拿回1400万的历史跨越——南开大学80年校庆给人们的思考》，那是1999年我在采访南开大学80年校庆时所写。照道理，参加这样一个普通的纪念活动，发一个短消息足已，领导也没给我布置什么任务。我当初也是这么计划的。但一进入采访，就要见机行事了。我采访的第一个校庆活动是“校长国际论坛”。进会场时，大会发给每位记者一个文件袋。入座后，我开始翻阅手中的材料。忽然，我对其中的一本杂志发生了兴趣。这本杂志名叫《风流人物》，封面是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的彩幅大照片。书中文章很多，有介绍南开大学80年历史的。但真正让我发生兴趣的是另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说，上海刚刚结束的“财富论坛”，净赚了1400万！我忽然灵光一闪：我不也正在参加一个天津的国际论坛吗？上海财富论坛净赚1400万，那么天津呢？我猛然间觉得血往上涌，无比兴奋。随着采访的深入，我有了一系列的发现。这个过程可以说有一些曲折，甚至还包括我起初的一些误解。但最终我找到了答案。

由此我体会到：

第一，新闻采访，更难的是发现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你采到了新闻，其实很可能忽略或放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。

第二，能否发现，往往就是一瞬间，就是灵感一闪。但它却是对一名记者职业素质的最重要的考核和检验。

第三，发现往往需要去伪存真。记得一位资深电视人曾经说过：看见的未必都是真实的。作为一名资深评论员，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新闻评论的重要。但这话用于记者采访，同样适用。作为新闻记者，看不见悟不到，是遗憾；没有看清和看透，也遗憾。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甚至是透过假象看

真实。这里，少不了发现的本领。

我们之所以说发现比较难，除了说需要执著、要有一股不怕吃苦、穷追不舍的精神之外，更需要一种悟性，一种独特的感觉，或者说是一种心灵火花的闪现。当然，从心理学的角度准确地来说，“发现”也属于思维的范畴，但二者又稍有不同：“发现”是感性的东西，属于感觉的范畴；而思考是理性的东西，属于知觉的范畴。换句话说，“发现”就是我们常说的职业敏感；而思考则是对发现的认知和论证。如果你在新闻采访时缺少感悟，那么，就是费再大的劲儿，抓来的也很可能只是一把糠，而不会是一把米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似乎可以断言，没有最初的“发现”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思考，“发现”在你的整个思考过程中具有先导和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当然，如果没有平常的思考做积累，没有当时的灵感碰撞，或许也就不会有关键时刻的“发现”。

如果说采访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的话，那我宁愿说采访更像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，像一个不断掘金和探宝的过程。作为新闻记者，要知道哪儿有宝，而作为一名广播记者，要时刻知道你的话筒该伸向何处。

我想很多记者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：最困难的，不是有了新闻怎么写，而往往是觉得没什么可写，或者是觉得“找不到角度”。实际上，不知道怎么写，或者不知道写什么，说到底，是没有发现新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是不会去发现。

感谢经济台《天津早晨》节目，让我当了几年没有“分口”的职业记者。那段时间，没接到过多少会议通知或活动请柬，跑的几乎都是社会新闻或经济新闻，全凭感觉，全凭自己去发现，我乐此不疲，倒也练就了一点特殊的本领。

我的这些关于“发现”新闻的感受，对我后来从事编辑工作大有裨益。尤其是在我做新闻热线编辑工作时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在听众打来反映各种问题的热线电话中，是很可能埋藏着极有价

值的新闻线索的。但很容易被忽略。通过实践我深刻地体会到，“热线电话中有黄金”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慧眼识金。收入本书的新闻调查《“大胡同”的经营者为什么交税难?》以及《红药水为什么要涨价?》，就是我从热线中发现新闻线索，进行追踪调查采访的结果。其中大胡同的交税难问题，还让我顺藤摸瓜，有了新的发现，又写出了续篇《两个天意（天奕）究竟哪儿不一样?》。

另外，收入本书的报告文学《一个终于公开的故事》，线索的获得也很偶然，那是我在和南开大学一位退休老教授唠家常时，他不经意间谈起的，当时真可以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。我当时就问他：您说的这些，从来没有对外界说过吗？他说没有啊。于是我如获至宝。这篇文章在《今晚报》上发表后获得该报当年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（一等奖空缺），两年后又在美国发表。有评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。

也许，在和“新闻”打了多年交道之后，我对它真的有了深厚的感情，也从中悟出了一些的东西。如在收进本书的《“新闻”的逻辑内涵及外延问题新探》，以及《“新闻”本质特征及派生特征辨析》中，我就提出：新闻的定义，不应仅局限于“新发生”，还应包括“新发现”；“报道”应该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，因为新闻的很多特性（如传播性和公开性等）其实都源于“报道”，而且，“报道”不同于一般的“传播”，记者“发现新闻”的主观能动性非常重要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一旦认识到“报道”是新闻的本质特征之一，那么很多我们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我的这些观点，不知您以为然否。但不管怎样，从这几篇文章中，您或许可以看出我对“发现”这一问题的重视。

## 二

回顾自己从事广播工作的17年，我所走过的路大抵是这样的：最初几年，主要是思考新闻稿件怎么写；后来大多是思考一个广播节目该怎么办。

我体会，个人跑新闻和带领大家办新闻节目，意思不一样；而办新闻节目和办专题节目，感觉也不同；而办专题节目和办娱乐节目，办法也不完全一样。

应该说我是幸运的。因为十几年当中，我从经济台到生活台，从新闻节目到专题节目，转了一圈儿，这使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广播样式，其中很多经历和收获真的是细致入微的，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。

1989年，当我刚刚跨进广播大门时，正逢直播板块节目“南风北渐”，同时正好是广播重新崛起之际。经济台《天津早晨》作为天津电台第一个开办的“新闻直播板块节目”，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。开始是当记者，后来当编辑，1989年7月3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亲切接见《天津早晨》部分编辑记者，他对《天津早晨》节目“讲究批评的艺术”，“小批评，大帮忙”给予了充分肯定。我有幸受到接见，亲耳聆听到李瑞环同志的讲话。8月，我任监制助理。开播一周年之际，我们在水晶宫饭店举行了与听众见面和答谢文艺演出。李瑞环同志为晚会写来贺词“天津早晨好，声屏系万家”。那一天下雨，却来了那么多听众，气氛之热烈，令人感动。那时电台还没有收听率调查，但《天津早晨》当时那种一呼百应的轰动效应，那种在听众中有很高威信的感觉，真是不在其中，不会深切体会得到。可以说，《天津早晨》始终让我有一种自豪，它那种摆脱说教、贴近听众、服务百姓的新的广播形态，犹如春风化雨，滋润了很多听众的心田。像其中的“朝朝问候”、“津卫拾趣”、“智慧的太阳——哲学趣谈”、“空中彩桥”等栏目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恐怕不光是我，很多当年的听众都很难忘怀。

但我到《天津早晨》的第一课却是从最简单的事学起的。还记得我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数字数——数一套十分钟的新闻节目稿的字数（录播），结果，因字数不够（差了大约一分钟），编辑又不得不重新去组稿。这可以说是广播给我上的第一课，它告诉我，

广播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马虎，都必须动脑，必须认真。

还记得我撰写的第一组广播评论《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》，虽受到一定好评，但也让我体会到，随着讨论的深入，我越发感到心里发空。我体会到，脑子里没东西，理论创新和广播创新真的很难。

记得京津塘高速公路修建之时，我与另一名记者赶赴工地，发回了一组自认为还不错的报道，但当我去征求一位老记者的意见时，他对我讲解了现场报道和一般录音报道的区别，使我这个半路出身的记者，第一次对广播现场报道的采写方法有了一些比较清晰和认真的思考。我逐渐认识到，要写好一篇广播新闻稿，一定要熟悉广播，既要符合新闻的写作要求，又要有广播特点。

新闻实践中，我也常常感觉到新闻主题的难于挖掘和把握，感觉到在掌握了大量新闻素材之后，却难于找到新闻切入点和新闻主题的苦恼。很久之后，我还是会遇到类似问题。收入本书的新闻专稿《放“小”放出新公式：1-1=2》就是这样。当我走访了三家转制的小企业之后，对如何确定新闻主题始终拿不定主意。因为三家小企业的情况并不相同。后来，我在反复听采访录音时，是被采访者的一段话启发了我，也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题目。

后来我办节目。先是到了《经济大世界》节目组，我和杨建申<sup>①</sup>创办了“热线导购”栏目。这个节目曾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。当时的市委常委刘峰岩同志亲笔给节目组写信，赞扬这个节目。为了办好热线导购，我们开拓创新，在开发区创建了“热线导购联谊会”，为实现社会化办广播积累了经验。我体会到，办广播，有时工夫是在广播之外。

再后来在办《空中商业城》节目的时候，我又组织进行了“天津市首届汤圆大赛”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杨建申，当时任《经济大世界》节目监制，后离职成为企业家。

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那些朦胧的想法和做法，其实就是对“广播产业化”的思考和实践，只是那时的认识没有今天这么明确，思想也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步。

广播的创新很难，但时刻需要。

记得1991年，我组织的一篇报道《天津时装亮相大连服装节》获得当年天津广播电视学会经济新闻评比一等奖。那时，热线电话在广播中才刚刚使用，但我在该节目中采用了三方连线——连线大连经济台，同时连线在服装节现场的天津代表。我觉得，它之所以能获奖，除了内容，形式上的创新恐怕也是原因之一。

在办《市场生活90分》节目时，我有意识地借鉴了电视的表现手段，让广播节目的音响要素更丰富，更富有层次感。收入本书的一套《市场生活》节目就具有这样的特点，当然遗憾的是，读者只能看而不能听。记得当时报评节目时，录音师曾惊讶地表示：我干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没有这样录过节目！

后来，我和另一名同志<sup>①</sup>一起办了一年的《个体私营经济之窗》，我们尝试着自己编辑、自己主持，这使我的广播经历更丰富了一些。

1998年，我重回《天津早晨》，记得不久即赶上'98中国天津出口商品交易会。会期将近，一问，根本没有经济台的记者证。我赶忙找到市外经贸委，争取到一个。交易会举办8天，我发稿18篇。会后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统计发稿情况，我把我的发稿情况报给他们后，他们惊讶地说：“嚯！这么多啊！”我在交易会期间采写的独家专访《进入跨国集团，实现“三外”同步发展——访外经贸委主任王述祖》以及新闻专稿《家乐福集团来采购意味着什么？》、《家乐福撩开神秘面纱》、《进超市，挡不住的诱惑》、《校办企业也能成为出口明星》和《新形势下外贸出口企业面临挑

---

<sup>①</sup> 齐丽，天津电台经济频道记者。